

（二〇二〇年五月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人物追踪】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周恩来传》选载	金冲及等
【动乱年代】	1966——串联琐忆	金雁
【广阔天地】	“上山下乡”岁月无悔？	邢小群
【亲历者言】	文革中我给江青做秘书（四）	阎长贵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人物追踪】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周恩来传》选载

• 金冲及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

一九六六年春，正当周恩来以很大的精力投入领导北方八省抗旱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大风暴正在悄悄地袭来。这就是持续达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前面说到一九六二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工作。随后又开了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制定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调整方针，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同意对经济实行调整，但并不同意处在“一线”地位的刘少奇等对形势的估计，认为他们把“大跃进”以来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正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些问题上，引起了他的“警惕”并开始考虑防止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

这一年下半年起经济形势开始有了好转，但由于国际国内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特别是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国际范围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发展，毛泽东把这些工作中的不同认识看成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八九月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系统地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严厉批评党内存在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奏。

一九六五年初，毛泽东对城乡“四清”运动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年九月毛泽东向地方一些领导人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这是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信号。

周恩来和其他中央“一线”领导人一样，对毛泽东仍一如既往地敬重和服从。长期以来经历的风风雨雨使他们对毛泽东重大决策的正确性深信不疑，认为他总是比自己看得更远些，更深刻些。即便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最后还是照毛泽东的主张去做，并且努力去理解和跟上他。

一九六四年底和一九六五年初，当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分歧在党内越来越明显时，不少迹象已给周恩来留下很深的印象。（2）但他没有料到会由此引发一场长达十年的“史无前例”的政治大动乱。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盛大招待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都出席了。招待会上周恩来致词说：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全面高涨，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现在，我国人民展望着无限美好的未来，正在满怀信心地迎接将要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3）

显然，这时周恩来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在经过几年调整后已见成效的经济建设上。

然而，只隔一个月，“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已点燃了：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进行严重的政治批判。这件事震动了全国。

由江青等一手组织策划的这篇文章，发表前有意隐瞒了中央“一线”领导人。周恩来事先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江青后来说他们为此“担了很大的风险”，“保密了七八个月”。（4）

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理论界引起普遍的反对。但由于它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十一月三十日在拖延二十天后，《人民日报》奉命转载，把它登在“学术研究”栏内。同时发表经周恩来、彭真修改审定的“编者按”，其中多处强调党对科学和艺术工作一贯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编者按”中指出：“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对吴晗，周恩来是有长期了解的。他力图把问题放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避免导致一场政治批判。

但问题没有到此罢休，不久，又把《海瑞罢官》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康生提出该剧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鸣不平。他的说法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性质，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周恩来和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听取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并同意彭真的意见，即：吴晗问题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任何联系，在学术问题上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二月八日，彭真等赶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的《汇报提纲》。毛泽东对《汇报提纲》没有表示反对。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彭真对吴晗的保护，使毛泽东更加深了对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印象。在打倒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时，毛泽东也已下定打倒彭真的决心。

周恩来没有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几乎和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彭真汇报同时，周恩来在外交部召开的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充分肯定彭真提出的“要树立一个新的外交风格”的建议。（5）在另外的场合他还表示：今年中央要好好抓农业，我也准备下去”（6）

三月十二日，即将离京赴河北一些地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的周恩来写信给刘少奇、彭真等，提出：在刘少奇、陈毅等出国访问期间可将中央掌管的外交、国防工作交彭真负责。并说：“需要我回京时，请彭真同志给我打电话，随告随到。”周恩来还向一个外国党的领导人说过：我是得到中央的批准，常常想到农村、地方上去看看。但是，在北京的中央同志现在不多，所以，我跟彭真同志订了个协定，一旦有重要的事情，他打电话要我回来，我马上回来。在场的彭真插话说：“总理在家，我们比较享福一点。”（7）

周恩来到华北地区去的工作重点仍放在抗旱救灾上，但国内的政治局势却正在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在杭州的毛泽东因为不满意彭真、陆定一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一次比一次更严厉地批评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与此同时，他还亲自批改由江青主持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在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提出整个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长期以来一直关心文艺工作的周恩来，三月间连续作过几次指示，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多下去，接触实际，接触群众，改造思想，提高艺术水平。他没有对整个文艺工作加以否定，也没有使用“黑线”专政一类的提法。（8）

从三月中旬起，离京不久的周恩来不得不中断他正在抓的华北农业工作，开始频繁地出席中央会议，讨论被看得愈来愈严重的“阶级斗争”形势。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进一步开展学术界、教育界的政治批判。周恩来从天津回北京后，十八日赶到杭州出席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也到会。会上，毛泽东提出全国都要开展广泛的阶级斗争，包括教育、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等各个方面。同时，毛泽东还批评中宣部在当前学术批判中没有支持“左派”，是在压制“左派”。

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正被越来越紧张的政治空气笼罩着。

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因上海沪剧《芦荡火种》不能在北京演出，当面批评彭真是搞“独立王国”。毛泽东问在场的周恩来：“你的感觉怎么样？”周恩来回答：“我还没有什么感觉。”毛泽东又问邓小平，邓小平也作了同样的回答。事后，彭真向周恩来谈了《芦荡火种》演出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并告诉他原来已经委托副市长万里安排好了在京演出的场次。周恩来问彭真：“那会上你怎么不说话呢？”彭真说：“我不好当面顶撞主席。”（9）

三月三十一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康生再向周恩来、彭真详细传达毛泽东二十八日至三十日的三次谈话。毛泽东在这几次谈话中更加激烈地点名批评彭真、陆定一等，甚至警告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的谈话，表明从发表姚文元文章开始的一场政治风暴正在扩展，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即便到这个时候，周恩来对他正在抓的华北农业仍一直牢牢惦念着，就在康生作这番传达的当晚，他又启程前往河北的石家庄、宁晋、冀县、邯郸、魏县、大名、临漳、磁县等地，视察并部署抗旱和邢台地震后的救灾工作。

四月二日，他在邯郸写给毛泽东并报书记处的报告中说：

“我三十一日晚到石家庄，四月一日到第二次地震重灾区五个地方看望群众和伤员，晚到邢台。”“二日至六日我在邯郸，视察各地打井抗旱春播生产工作。拟每隔十日回北京一次。如有急事，当由彭真同志告我赶回。”（10）

周恩来坚定不移地抓农业，是有长远考虑的。他这时说过：人生下来，第一件事是要吃饭，要穿衣服。吃饭、穿衣的材料、原料，都是农村来的。对六亿农民，要教育他们，支持他们，鼓舞他们。（11）

四月十日，他在回答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提问时再一次强调：

“中国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中国人民正在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论遇到什么风浪，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2）

在中国实现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周恩来长期以来一直放在首要地位考虑的由衷愿望。

然而他的这种愿望的实现一次又一次地被打乱。越来越紧张的学术批判形势已不允许周恩来继续集中精力抓华北农业工作，他原来计划的“每隔十日回北京一次”的日程安排也无法做到了。四月九日、十一日和十二日，他出席讨论学术批判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康生再次传达毛泽东近来的一系列批评后，决定撤销经中央批准并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彭真和周恩来等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表示：“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13）

四月十六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叶剑英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会议期间，周恩来找彭真谈了三次话。二十八、二十九日，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严厉指责，并在党内一些文件上删去彭真的名字。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问题”。这次会议和同年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在会议的前期，周恩来因为陪同来中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在四月二十八日来华，五月十一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

周恩来同他们举行多次会谈，并陪同他们访问华北、东北、华东等地），没有出席前期的会议。

五月五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杭州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毛泽东在会见时说：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把坏的）一层层地剥掉。四十五年来，前后一共“剥掉”了几十个中央委员、但现在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毛泽东的这个意思，在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中表达得更为明确，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写下的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同到会的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周恩来也表示同意中央《通知》，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但他这时并没有理解《通知》中这段话的真正含义。用他后来的话说，当时虽然已有些猜测，却未曾想到是指刘少奇。（14）连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本人也是这样。《通知》通过后的第三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会见一位外国党领导人时，都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15）可见，对毛泽东的意图，中央领导核心的这些成员仍全然没有觉察。

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经康生策划，北京大学干部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内贴出矛头对准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有关部门的大字报：《陆平、宋硕、彭珉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北大校园立刻沸腾了，许多师生员工站出来批驳聂元梓等的观点。当天夜里，周恩来派人前往北大了解情况，严肃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做法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规定，是破坏纪律的行为。（16）

康生却背着在北京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私下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送给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六月一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大字报向全国广播。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这篇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件事立刻引起极大的轰动。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贴大字报，开批斗会。“造修正主义的反”。“文化革命”运动在北京和全国迅猛地展开。和当初《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一样，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这件事都毫无思想准备。陈毅曾就发表聂元梓等人大字报一事当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周恩来回答道：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说要发表这篇大字报。后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写下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显然，这里是有所指的。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使运动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防止在运动中出现严重违反党的政策的混乱现象，六月初，周恩来连续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统一领导各校“文化革命”。为此。中共中央拟定了“八条指示”，再三强调各单位运动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等。

六月九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起飞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提出：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当刘少奇等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时，毛泽东要刘少奇等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17）

六月十五日，根据原先决定却一再推迟的计划，周恩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这时的首都北京，已处于令人难以捉摸无法预料的政治气氛中。各党政机关大中学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各种批判会、声讨会、斗争会的调子不断升级，到处人心惶惶。行前，周恩来仍向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和北京市交代要支援京郊农村的“三夏”劳动、鉴于各单位因搞文化革命抽人困难，周恩来明确指示：“每部、委都应参加一部分人，这也是一种考验。”（18）

在为时半个月的出访中，周恩来的心情一直处于一种异乎寻常的紧张状态中。在回国途经巴基斯坦时，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发现：周总理同以往有些不一样，缺乏通常的那种爽快的情绪——是否因为太忙和太疲倦，还是其他原因？（19）其实，最使他放心不下的还是国内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

七月一日，周恩来回到北京。这时，一些大中学校中已出现乱批乱斗、对批斗对象（主要是党政负责人和教师）进行毒打和人身侮辱等严重问题。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对工作组废存去留的两种不同意见正在激烈交锋：刘少奇、邓小平等坚持运动要有党的领导，要较有秩序地进行，认为在许多学校的党委已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派工作组是必要的；而陈伯达等却几次反对派工作组，认为这样做不利于放手地让群众起来“革命”。（20）第二天，已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把一封反映对外文委机关运动、“揭发”以张彦为首的工作组的来信转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这件事，周恩来提出，应该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再报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决定工作组撤与否的问题。（21）

然而，毛泽东这时的想法却同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大相径庭。

七月八日，在武汉的毛泽东写了一封当时没有发表的信，提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信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设想：“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周恩来见到了这封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还就信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找在大连的林彪商量，劝说林彪对毛泽东的称颂应该注意实事求是，用语“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22）但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种指导思想，自然同周恩来和其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的原有想法有很大距离。

十天后、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他一回来，就以尖锐的语言提出：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

不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京的中央领导人都分别选择一所联系院校，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以取得对运动的“感性认识”。周恩来选的是地处北京东郊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这里距市中心有十几公里，比较僻静。从七月二十四日起，周恩来用几天时间赶去看大字报，同师生们谈话，在礼堂坐在马扎上听学生们发言，到职工食堂吃饭、自己付钱和粮票。（23）他向师生们解释说：我为什么要选择你们这个地方呢？因为你们学院在东郊，没有旁的学校。我要是去八大学院，消息就保不住，两个小时都保证不了。（24）这时。他仍表示“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的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25）

就在这个期间，毛泽东听了陈伯达、江青等的汇报后，已经认定派工作组是压制群众、阻碍运动，下决心撤销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他严厉地指责说：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26〕这无疑使周恩来感到困惑。七月二十八日，他第三次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时对师生们说：在这场运动中。主观上革命的。不一定不犯错误；百分之百的对是没有的，我就不保险。

第二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大中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出席大会。周恩来在讲话中说：

“第一点、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不论在中央、在地方，还是在政府里），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有时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估计不足；第二点，是因为对解决问题的认识上的错误，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北京。”“就是怕乱”，“因为青年人批评起来，辩论和斗争的界线就很难定”。“总之，这是一个新的事物，新的运动，我们过去都不熟悉，特别是我们年老的人更不熟悉，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27〕

八月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全会，原定开五天，主要是要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文件，是六月下旬开始由陈伯达、康生主持起草，中间几易其稿，主要内容是阐述“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和若干政策。它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在讨论修改过程中，根据周恩来的意见，陶铸、王任重等主张删去原稿中有关“黑帮”、“黑线”的提法，在稿中加入对党的干部队伍状况要进行具体分析的内容，肯定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修改后的文件，送毛泽东审阅时得到他的同意。

全会开幕当天，毛泽东在会上激烈指责派工作组的做法，认为工作组“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都是干尽了坏事”。同一天，他写信给反对工作组的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热烈的支持”。这时，全国各学校已普遍出现揪斗工作组的现象，并开始冲击派出工作组的各党政机关。这封信对他们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第二天的会上、周恩来在发言中说：

“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要替北京市负起更多责任来。主席一号说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而我们直到主席回来，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投身到战斗中免不了犯大错误，我就犯过大错误，现在过问这个事情一定也要犯错误。要做这个精神准备，犯错误就改。要能够听不同的意见，多方面的意见来比较，如果自己想得不对，请教于群众，请教于主席，请教于中央。大家来想，总会做得好些。”〔28〕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常委委托周恩来在撤销工作组后“过问”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问题。这对周恩来又是一个不小的难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件事对我既光荣又艰巨，因为我对清华大学可以说毫不熟悉，没接触，仓促上阵。搞不好，也要像工作组一样，也要‘撤’走的。”〔29〕

八月三日、四日，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指责更加尖锐。他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改变原定议程，延长了会期。周恩来似乎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变故，他再次叮嘱值班秘书：如果主席处通知开会或谈事情，即使我已经休息了，也要把我叫醒。（30）

果然，在八月五日，毛泽东写出了使全体与会者震惊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用极其严厉的词句批评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指责他们“在五十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他还写到：“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这篇极不寻常的“大字报”第一次在党内高层中公开了他长期以来对中央“一线”工作的不满，并且把派工作组这件事提到了“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那样的高度。这些，周恩来都摆脱不掉“干系”。但毛泽东并没有把周恩来列入“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内。

据当年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廖汉生回忆：“一天晚上十二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厅里召集军队各总部负责人，海、空军负责人开会，北京军区杨勇和我也出席了。我当时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这次会是打招呼会。周总理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打招呼会散了，周总理又向各省、市第一把手打招呼。”（31）

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周恩来也是到这时才明白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所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的是谁。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全会上印发后，陈伯达立刻写下一份响应的“大字报”。会议也由此改变原定日程，开始转入对刘少奇、邓小平等的批判。在这期间，周恩来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他对廖汉生等两次说到“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说明他已明白这种发展趋势是难以改变的。在毛泽东“大字报”印发的当天，周恩来叮嘱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要他抓紧做好群众来访接待人员的教育工作，让大家端正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解决头脑中怕“乱”的思想。（32）

八月八日晚，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对他们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这些话使全会的气氛更趋紧张。

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重新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十一人当选。但新当选常委的排列次序有了重大变化：林彪紧接毛泽东之后，一下子成为“第二号人物”；而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退居第八位。在后来公开宣布党中央领导人职务时，除林彪以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人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邓小平原来担任的总书记职务都不再提起。毛泽东在全会闭幕式上说：这回组织上有些改变。是为了保证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及全会公报的实行。“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

对于六十八岁的周恩来来说。一场空前的政治大风暴，已经不可避免地摆在面前了！他已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

注释：

- 〔1〕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卡博、巴卢库时的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毛说：1962年1月召开七千人大会，“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所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也提到“1962年的右倾”。
- 〔2〕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会上的讲话记录，1971年6月18日。
- 〔3〕《人民日报》1965年10月1日。
- 〔4〕江青：《为人民立新功》，1967年1月12日。
- 〔5〕周恩来在外交部召开的第4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2月8日、9日。
- 〔6〕周巍峙整理的周总理3月间对文艺工作的几次谈话和批示要点，1966年3月。
- 〔7〕中越两党领导人会谈记录，1966年3月24日。
- 〔8〕周巍峙整理的周总理3月间对文艺工作的几次谈话和批示要点，1966年3月。
- 〔9〕访问项淳一谈话记录，1981年1月6日。
- 〔10〕周恩来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66年4月2日，手稿。
- 〔11〕周恩来在第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4月9日。
- 〔12〕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伊查兹·侯赛因谈话记录，1966年4月10日。
- 〔13〕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就当前学术批判等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1966年4月12日。
- 〔14〕周恩来接见解放军三军文工团部分文艺工作者的讲话记录，1967年5月21日。
- 〔15〕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与胡志明谈话记录，1966年5月18日。
- 〔16〕林浩基：《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出笼的——揭露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本文根据林访问前北大党委书记、校长陆平后所写），《北京日报》1981年1月9日。
- 〔17〕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434页。
- 〔18〕周恩来关于支援北京市郊区麦收问题的批注，1966年6月12日。
- 〔19〕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苏尔坦·穆罕默德·汗谈话记录，1966年7月17日。
- 〔20〕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1日。另据陈伯达致毛泽东的信，1966年8月11日。
- 〔21〕周恩来就对外文委机关运动中的问题致康生、陶铸并报刘少奇、邓小平等的信，1966年7月1日，手稿。
- 〔22〕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17页。
- 〔23〕李越然：《日月千秋 松柏长青》，《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344页。
- 〔24〕周恩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7月25日。
- 〔25〕《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593页。
- 〔26〕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的谈话记录，1966年7月25日。
- 〔27〕周恩来在北京市大中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7月29日。
- 〔28〕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2日。
- 〔29〕周恩来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1日。

〔30〕周恩来总理值班室《工作日志》，1966年8月5日。
〔31〕访问廖汉生谈话记录，1981年2月18日。
〔32〕周恩来总理值班室《工作日志》，1966年8月7日，10日；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66年8月10日。

□ 摘自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著：《周恩来传》，第四卷第六十四节，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

## 【动乱年代】

### 1966——串联琐忆

· 金 雁 ·

1966年我刚刚进入中学不久，“大串联”就开始了。

初时此项荣誉只属于由学校选出少数人组成的“赴京代表团”，我们初一新生想都别想。他们回来后讲述在赴京路上沿途的革命形势以及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激动心情，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我们挤上前去相争与这些“赴京代表”握手，以求沾染点“领袖的光芒”。

不久便听说所有学生都可以免费乘车“串联”，学习外地红卫兵的经验。在我们看来这简直就是免费旅游。我哥得到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就与几个男生组成了精干的“毛泽东思想小分队”，呼啸而去呼啸而回，两次外出。每次回来都给我们带来无比新鲜的见闻，听得我们只有仰慕的份了。我很想加入其中，一般情况下我哥还是带我玩的，不料这次遭到了他们团体的一致排斥——“扒火车打架”带女生是累赘，虽然我力争表现男孩子做的任何事我都能做，但还是被集体否掉了。

无奈之下我们刚上初一的四个胆大点的女生结伴而行。我们刚进校这一届女生出去“串联”的人不多。家长们不放心这些十二三岁的女娃娃们到处乱跑。我十一岁那年自己一个人从L县坐火车到天津，还从北京中转，一路上顺风顺水，自认为是有出行经验的“小老江湖”。其实当时有两位沈阳设计院的叔叔同行照顾，在北京转车时列车员也帮了我不少忙。

父亲支持我到外面“经风雨见世面”，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看看原来西北局党校那些同事现在的处境。

我们还在家时前怕狼后怕虎，唯恐考虑不周，觉得出远门什么都需要带。到了车站才发现，恨不能全国的中学生都出来了，很多人一个小挎包一个军用水壶，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住到哪里。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吃饭住宿都不要钱，学生之间很容易就打成一片了，凡事多问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但我们发现，“大串联”远远不像我们当初想的那么浪漫。同行的其他3个女孩都是第一次乘火车，出门之前激动不已。结果发现所有的客车都严重超员，车厢里塞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程度无法描述，每一个座位空间都容纳了数倍的人员，仅仅上车这一关就是很大的考验。

兰州到北京、到上海的远途直快在我们这里停靠，一律不开车门，只有个别男生从打开的车窗缝里硬挤了进去。我也想如法炮制，因为如果不这样，根本就上不了车，但是其他女

生不愿意，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小集体还没有上火车就面临着解散。想着我们大家事先拉钩起誓，一路上不吵架斗嘴，不分散行动，无论任何情况都要同去同归的约定，只能作罢。其实如果一没有人在车窗里接应，二没有人在下面助力，我是根本爬不进去车窗的。

等了很久我们终于坐上了一趟到宝鸡的慢车，看这个架势只能一段一段走，走到哪里算哪里了，原订直奔北京的计划根本行不通。一上车我们就挤散了，车厢里人都挤成照片了，座位下面、靠背上、行李架上都是人，吃饭、喝水的供应都无法进行。我和另外两个女生卡在厕所里就动弹不得了，唯一的好处是万一内急还有地方处理。

后来一个女生要上厕所，让我到她的位置上暂坐一会儿，我这才进入车厢落座伸伸腿。车开动起来晃动的人均匀一些，不像刚上车那么脸贴脸、背靠背那么狼狈不堪。年轻人很快熟络起来，南来北往的学生讲着新动向和各地趣闻轶事，对我们这些刚刚踏进中学的人来说都新鲜无比，真是大开眼界。

我甚至还碰到一个我们学校初三的男生，因为长得黝黑，不太像汉族。他就和别人说他是“藏族”，本地土话加上俄语似的卷舌音，唬得四周的人一愣一愣的，纷纷掏出笔记本让他签名留地址。正好有一位西北民院的真藏族学生打水路过，两句藏语问答就使他露馅了。因为沿途都要向快车让道，列车走走停停，从陇西到宝鸡30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花了十多个小时。

到了宝鸡刚开始我们没有出站，想着这里是大站，也许可以乘下一班去北京的火车。但宝鸡车站已经聚集了大量准备从陇海线进京的学生，几次上车“冲刺”都失败了，我们人小挤不过那些男生。由于一整天基本不进水米，已经人困马乏，只好在宝鸡休整一天再从容计议。

于是我便去宝鸡市委找曾任市委常委的Y和Y阿姨，他们是父母的老同事，他们的女儿小青是我的小学同学。然而市委大字报栏里已经到处都是打倒、炮轰Y的大字报了。叔叔告诉我，西北局和党校都已大乱，所有的头头脑脑都遭到批判，凡是地下党的都成了叛徒，就连那些先前批判过我父亲的“反修斗士”也都成了黑帮。他忧心忡忡，也不知道这种状况会持续多久。阿姨则说，你妈心真够大的，这种形势下，还敢让一个小女娃到处乱跑。

看到宝鸡车站积压的学生，估计东去的列车我们这些小女生是挤不上去的，于是约定见车就上，不再纠结是否一定要到北京了，走到哪里算哪里。最后我们挤上了前往成都的慢车。宝成线的特点是山洞多、会车多，会车的原则一般是慢车让快车，普快让直快、直快让特快，就这样一路上走走停停，几乎走了一天一夜才到成都，等到下火车的时候，我们的脚肿的像馒头一样，都不会走路了。

好在到处都有红卫兵接待站，我们被分配在成都师范，在教室里打地铺，在学生食堂吃饭。十几个人住一间教室，地上铺着上体育课用的垫子，我们四个人铺两床盖两床。白天就在街上看大字报。到处都是控诉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四川“走资派”的文字。其中李井泉当时尤其是众矢之的。他是西南局第一书记，相当于西北局的刘澜涛，1949年前在晋绥搞土改斗死的人最多，大饥荒时主政四川，更是饿殍盈野，饿死人数居全国第一。

文革中李井泉被川人整的很惨。但古怪的是：起来“亮相”造反并一度成为四川文革风云人物的，却是李井泉手下一对比他更“左”的干将、曾分别担任宜宾地、市委头头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这两人在文革前官场上被李井泉整过，如今趁乱起来报复，说李井泉还是太“右”了，犯了包庇阶级敌人的罪过！

父亲关心局势，每天都搜罗很多的传单，所以这些“诸侯”我都不陌生。看大字报之余，我们还去了大邑县刘文彩庄园、去了武侯祠、去了青城山……

成都到底是天府之国，虽然红卫兵接待站的伙食一般是2—3两米饭一加份素菜。对我们好久没有见到大米的人来说，真是甘之如饴。而且街上的小吃种类繁多，价钱便宜，可以说既过了眼瘾也过了嘴瘾。而且我们还发现了有一处地方买大米不要粮票。在L县大米是稀罕物，家里存着一点，有病的时候才抓两把出来熬粥。我记得姥姥曾经说过，小站米和粳米好吃不出数，籼米出饭量高。怕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就碰不到了，于是买了五斤籼米，结果一路上这五斤米的负重增添了无穷的麻烦。

当时接到命令说，串联暂时停止，等铁路部门休整和各地接待工作更加完善以后，何时重启等待通知。我们当时认为，以后还有机会，虽然很不情愿就此打道回府，但服从命令听指挥是毛主席好战士。从外地取经回来，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我们几位初中生组成了“红色反修战斗队”，领了油印机、纸张、笔墨，根据外地的传单和别人的大字报，我们也刻蜡板印传单。不久全校从高三到初一年级编制打乱，混编为八大战斗组，由高年级学生带领我们这些初中生“闹革命”。

初中生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蛮劲，革命热情尤其高涨。这种全新的生活起初对我们来说充满了新奇和刺激感，那时候父辈还没有受到冲击，革别人的命总是刺激好玩的。我们跟着高中生屁股后面转，但是比他们更纯粹更投入，批判工作队，给老师贴大字报，一旦有了具体对象都会冲锋陷阵。

而我在批斗老师过程中下不了狠手，被革命同学认为立场不坚定。有一次学校开批斗老师大会，每个老师戴一顶高帽子，最后纸糊的高帽子不够了，就给排在后面的两个化学老师头上各扣了一个铁皮水桶。我们穿着借来的男式军装，带着军帽系着皮带，站在台上每一个挨批斗老师的后面作押解状，以壮声势。这种角色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与的，是被已经控制学校的高年级同学指定的。

在押往批斗现场上台阶的时候，化学老师因为水桶一直扣到脖子上，看不见前面的路，一下子就跪倒在台阶上。我完全是下意识地“哎呦”一声，就把老师扶起来了，然后一直把他扶到了台上。这下可好，立刻有人喊口号要求把我撤下来，说我阶级立场有问题。事后红卫兵组织领导人人都批评我，要我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而我并不认为做错了什么，辩解道对看不见路的人来说，如何让他走到批斗台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摘掉桶让他自己走，要么就要有人扶着他走。大约他们觉得我不适合做押解员，以后就不让我上台了，我还很失落了一阵子。

不久我们被高中生整合进“八一兵团”。我吃住都在学校里，连家也不回。用当时的话讲，满怀热情投入到“革命的大熔炉”中去，忙着当播音员，当宣传队员、写稿子排节目，写大字报，给高中生打下手。班上的同学分成两派，一派属于“红三司”下属的“八一兵团”，另一派属于保皇的“陇革”。两个群众派别都在指责对方走的封、资、修的黑路线，而自己对毛主席最忠、贯彻毛主席指示最坚决。两派由辩论逐渐升级到相互围攻动手阶段。

“陇革”的一帮男女同学占领了学校旁边的钟鼓楼，居高临下的大喇叭对着另一派实行“高分贝的噪音轰炸”和语言挑衅。“八一兵团”立即发起争夺钟鼓楼的战斗，未果。于是封锁下楼通道，就像马谡在街亭被围困在山上一样，一连几天对孤楼实行断水断粮。最后他们只好认输投降，被押解下来。

坊间老百姓说，这男男女女在上面混杂在一起这么些天，估计下来“娃娃都有了”。12岁的我并不明白此话是什么意思，但知道不是好话，由于派性的缘故，就鹦鹉学舌跟着起哄。在钟鼓楼上正好有我们班一个女生，她听到了就纠结了一帮该派的男生要来打我，吓得我赶紧去“八一兵团”搬救兵。

眼看着“武斗”从“冷兵器”发展到“热战”。我哥和一帮高中生们用墨水瓶装填土炸药雷管引信在做手雷试验，好像效果还不错，威力挺大的，震得教室玻璃哗啦啦响。我们几个女同学在一个小教室里裁纸打浆糊，正准备写大字报的用品。突然一个滋滋冒烟的墨水瓶滚进了教室，眼看引信就要燃完，女生们一片惊慌呼喊，钻桌子翻窗户四下逃窜躲避。我一个箭步奔向教室门口，准备夺路而逃。一个初三男生双手撑在门框上不让我出去，眼看墨水瓶就要爆炸了。

就在我脸色煞白急的快要哭出来时，听见窗外男生的笑声。我这才发现墨水瓶里既没有炸药也没有雷管，腿软的一屁股坐在地上。那帮坏小子们探头进来，说我们打赌，看你们这群女生里会不会出一个“王杰、刘英俊”。

有人说，我们认为，金雁最有可能为了保护大家，奋不顾身地把“墨水瓶”捡起来扔到窗外，结果没想到她是第一个抱头鼠窜的。看来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我气得两天都没理我哥，认为他带头使坏的。事后想想，如果真是土炸弹的话，怎么可能会出现堵住门口不让我们出来的事？我也是给吓糊涂了。

后来街上有了批父亲的大字报，父亲头上被扣上了五顶吓人帽子：历史反革命、黑帮、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异己分子，而且遭到游街批斗。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氛围中，我从“革命小将”变成了“狗崽子”。

□ 来源：来源：《秦川雁塔》微信号

~~~~~

【广阔天地】

“上山下乡”岁月无悔？

• 邢小群 •

上世纪60年代初，还乡知青和城市初高中毕业生下乡插队已经有了先例。60年代末大规模的上山下乡知青分两大类，一是生产建设兵团知青，有固定工资，比在农村挣工分收入高而且稳定，但是劳动强度特别大；二是到农村插队的知青，虽然很多人的劳动根本养活不了自己，但是在乡下相对自由，劳动强度大小完全在自己。

上山下乡开始时，听说我们太原68届初中毕业生（其实只上了一年初中）要分配到工厂。我不想当工人，觉得当工人干着一个工种，反复做着一件事，很枯燥。若选择插队，多是服从学校安排，和同学们一块走。也有政策：自愿组合，投亲靠友。

这时，与我家同院居住的赵树理的儿子赵二湖和他的几个同学要到一个熟人的家乡插队，问我们愿意不愿意一同去。赵二湖说他去过那里，住窑洞，冬暖夏凉；当地虽是丘陵旱地，但产麦子，一年有一半时间可吃白面。听了他的介绍，我和我二姐同意与他们一起走，父母没有反对。赵二湖是邻居，两家的孩子在一起，父母也放心。

1968年年底办好了插队手续，1969年2月过了春节后，我们就下了乡。

◇ 村里人把能灌上洪水的地视为宝地

我插队的地方，按当时的称谓是山西省临汾地区洪洞县明姜公社郭家节大队南山底小队（村）。从20里以外望去，这个村子就像挂在霍山支脉的半山腰上。下了火车，生产队的马车行走40多里把我们拉到村里时，这个村子在我们眼前是坐落在山脚下的，它仿佛是上山的起点和下山的落点。

全村约三十多户人家，都住在窑洞里。窑洞顺着山势，高一层低一层，错落有致。家家都有自己的院落，院里种着树，夕阳西下时，在远处地里干活的人望着村里的袅袅炊烟、听着鸡鸣狗叫声，那种家的感觉很是温馨。

村里没有河，饮用水取自一口十几米深的水井，水是山泉，又凉又甜。村里人吃水要担着桶上坡下坡地挑。好在村子不大，取水还算方便，不像在大西北某些干旱地方，要么积水而食，要么到十几里外去挑河水。

我们村的水井边，有村人用石头凿的水槽，内有凿成斜面的搓板，水槽边还有用棒槌捶洗衣服的光滑石板。村里一棵巨大的皂角树全村共享，树上的皂角自产自用源源不断。衣服揉进皂角被棒槌捶打得很干净。再脏点儿的衣物，就用碱面。

村里人也知道我们使用的肥皂，但买不起，只是羡慕。水井在村当中一处土坡上，站在家门口往下一望，水槽空着，就可下去洗了。

村中央有一条布满大大小小鹅卵石的沟。每年八九月间下大雨，沟里会卷来滔天的洪水。说是靠天吃饭，一有洪水来，村民可将洪水引入一层层梯田里。村里人把能灌上洪水的地叫漫地，视为宝地。因为洪水带来了山里的腐叶和羊、鼠、鸟粪，漫地不用上肥就很肥沃。

这样的梯田，小麦单产五六百斤，比平川一带水浇地的产量还高。因此，这里一年能吃上半年细粮，实在是吸引人的好地方。

当然，遇到干旱，老不下雨，产量会减半。发洪水时，村民还有一大收获，就是捞湿柴。那是山里的干柴被暴雨冲下山顺水流而来的。老老少少把从河边捞的湿柴拿回家晒干，非常好烧。

我曾看到一篇小说，讲的就是捞柴的故事，那情景和我在村里见到的一样。而平时，村中央这条泄洪沟却是干的，沟两边的人家来来往往地走动，如履平地。

◇ 各家家里不设门，用布帘挡着

也有人住砖窑，砖窑造价比纯土窑洞高得多。印象中，只有一户是四面到顶的砖窑，也就是窑洞一样的砖房，男主人是公社信用社主任。

生产队长家土窑的前脸是青砖砌成的，也比较显眼。尽管这个村子可以烧砖，但买得起砖的人家很少。村里的土窑洞，大大小小都有，印象中放羊的陈发科大叔是外来户，他是单身，窑洞最小。

一般人家的窑洞都是三孔连排，中间一孔，相当于堂屋，两边各有一孔，住人。不同于平川砖瓦房的是，伸向两边窑洞的走道较长，隔音效果特别好。里窑说话，外面是听不见的。

因此，各家家里不再设门，用布帘挡着，进门怕不方便，咳嗽一声就行。三孔连接的窑洞往往是一边住着父母，一边住着儿女，中间隔着堂屋。如果儿子娶媳妇，另外植窑洞，多在同一院植一孔或里外相连的两孔。

我们村的窑洞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那种单孔窑不大相同，也许人家是为了拍摄方便。

我们村里的大窑洞，也让我们开了眼界：几十号人进去都不嫌挤。大窑洞往往年代久远。村里50多岁的姬大伯告诉我，他家的窑洞在他爷爷活着时就有了，恐怕已有上百年。

老窑洞的窑顶嵌着三根很粗的大梁，大梁的颜色已呈深古铜色。窑洞夏天进去非常凉爽，冬天也不冷。富裕点的人家窑洞里北面又套着小窑洞，用布帘挡着，进去以后，里面并不小，只是没有窗户，多是盛粮食的大缸，也有放衣物的木柜，并不潮。如果小窑洞又套着小窑洞，堆着的是秋天挖出的红薯，什么时候拿出来都很新鲜，也不见缩水。

我们的房东是两家中农，叔伯兄弟。道理很简单——贫农没有多余的窑洞让我们住。村里没有富农，多数是中农。贫农很少，一问，都是从河南逃荒过来的。

两家房东的窑洞里都有不少大缸，他们告诉我，过去家家窑洞里都有年年替换的甚至放了几年的谷子、麦子。吃多少，就挖出多少碾成米、面。平日里，吃豆腐、割块肉、买西瓜、量油、打醋，想吃什么，都是从缸里挖出粮食来换。

要办红白喜事，得挖出粮食到集市上去卖，换回用品或钱。娶媳妇下定礼，说好多少石，就到窑洞里挖粮食。陈芝麻，烂谷子，放在缸里不会坏。

而我们去的时候，家里很少有隔年的粮食了。到青黄不接的时候，眼巴巴地就盼着返还的粮食快来。

◇ 这里的人谈阶级斗争，有点“不知有汉”的味道

我们这个小村，曾经是革命老区。本村两个大户都姓李，相互也是亲戚，只是隔得远了点。后来介绍我入党、住大窑洞的姬大伯是中农，38年的老党员；另一介绍人李大叔也是中农，43年的党员。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的中农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好在这个村子地处偏远，没有富农，中农又不能斗中农，贫农没有家族势力，他们要起来和村里的中农干仗，恐怕早让村里人赶走了。

贫农从心里感念村里人对他们的收留，比如放羊的发科大叔就是如此。所以，一直没有从老乡的嘴里听到他们搞阶级斗争的事情，让这里的人谈阶级斗争，有点“不知有汉”的味道。

村里人一开始很好奇，对我们的穿着、用具感到很新鲜。老乡们不懂得为什么城里的学生娃要上山下乡，要向贫下中农学习；因为毛主席让青年学生下乡，所以只能照办，其实他们心理上是抵触的。

虽说第一年我们有国家供应的商品粮，但从第二年起，我们就要分吃村里人的口粮了。地还是那些地，产量也没有多出来，却让我们几个知青分去一千多斤夏季、秋季的粮食。

村里人都烧柴，要烧煤得到五六十里外去拉，况且也没有买煤的钱。我们去了也要烧柴，上山砍伐他们赖以生存的灌木为柴，等于让我们占去了不少他们有限的生产和生活资源。

后来，他们看到我们劳动很卖力气，特别是女生，抢着干村里女人不做的事，如担担子送粪，跳到麻坑里踩馊臭的绿麻，加上我们对他们很尊重，大叔、大婶儿地叫着，慢慢地就改变了心理上的不快和戒备。

山西农村珍贵女人，除了农忙季节，妇女多不下地做农活。他们说：这些娃们也不容易，从没有吃过苦，能到咱这地界儿，就不错了，他们爹妈知道了还说不定多心疼呢！

我们插队的时候，村里还没有拉上电线杆，晚上没有电灯，取亮是靠煤油灯。油灯的样式什么都有，铜制的高脚式、碗式，还有用小墨水瓶，放上煤油，用棉花做捻儿的灯。用炕前的灶烧饭，烟从炕道走，炕就暖和了。

窑洞墙厚窗小，有了热炕，其实很暖和。冬天，妇女们除了做饭，就是盘坐在炕上纺线、做鞋、做衣服。那种热炕头的感觉，确实让人心生暖意和安逸。这才懂得什么叫作“老婆孩子热炕头”。

◇ 腰一直弯着，负着棉花的重量，经常疼得直不起来

我们刚到村里时，还没开春，干的都是冬季的活儿，比如，往石灰窑里担石头，到砖窑出砖。这个村子的副业，主要是一口石灰窑、一口砖窑，生产的石灰和砖头要拿出去卖。我们村年终分红，一个工分值五六角钱，比起有些穷困地方一个工分值几分钱好多了，全靠这两孔砖窑和石灰窑的收入。

砖窑的活儿是把晒干了的土坯砖搬运到砖窑里，或从窑里搬出烧好的红砖、青砖。每天早晨，生产队长先派我们往山坡上的地里送粪。村里的地，有远有近，远的离村有好几里，一个早工，两个小时，只往地里担一担粪，就收工回家吃饭了。饭后，我们又被派到窑上担石头。

开始，扁担压得肩膀肿了消，消了肿；从水井上往家里担水，一次只能担半桶。后来九十多斤重的一担水，上坡下坡也无问题了。

我们感到最累最难耐的，一是夏天在闷热的玉米地里锄草，二是秋天摘棉花。秋季旱地庄稼讲究的是锄草保墒。村里人认为，一季三除，即使没有雨，也能有七成收获。

除草时，村里的男人上身都光着，肩膀上搭一条擦汗的毛巾；男知青也学着村里人光着上身，而我们女生，就得穿着吸汗的衣服，埋头在青纱帐里边锄草边向前走，闷得喘不过气来。

到了摘棉花时，一条床单叠两层系在腰上，边走边摘棉花往腰里揣。旱地的棉花长得不高，摘起花来几乎一直弯着腰，从地头这边到地头那边，一路走下去，腰里的棉花压得再也走不动了，才把棉花拿出来放在垄道上，收工前再来取。

工分是按摘棉花的重量来计算的。腰一直弯着，而且负着棉花的重量，经常疼得直不起来。这样摘几天，我的腰感觉都快折断了。后来，落下严重的腰肌劳损症，胳膊也晒成深古铜色，直到今天，也没有还原成本色。

◇ 单是女知青敢上山砍柴，就让村里人大跌眼镜

秋天上山砍柴，也是我一生难以忘记的经历。收了秋，第一场雪来临前，是村里人砍柴的时间，断断续续大约有两个月。老乡是当年烧去年的、甚至更早年的柴。当年砍来的柴码放在院子四周，风吹雨淋太阳晒，越干得通透越好烧，也越节省。

因此，看一家人会过不会过日子，进门先看柴火垛。家境越殷实，柴火垛越高、越厚。知青没有任何家底，自然也没有隔年的柴，砍来的湿柴，当年就烧。本来柴就少，又湿，在烧柴方面总是捉襟见肘。

砍柴着实让我有了一番历练。深秋，清晨，一觉醒来，找出既耐磨，又比较破旧的衣服穿上，急忙吃了早饭，带上一顿干粮，柴刀上勾着一条粗绳，踏上一双球鞋，就随老乡一起上山了。

房东大哥成了我们的师傅，相随的还有和我们一起混的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最愿意指指点点教我们做这做那。随着秋色一日深似一日，我们出发的时间一天比一天显得早，有时天边刚有曙色，我们就上山了，月亮挂上天幕，才返回村中。

老乡们最怕下雪，一下雪，就进不去山了，因为山道太窄，雪很滑。村里的女人是不进山砍柴的，但女知青没有权利让男知青代劳，不顾村里人怎样说，也要进山。

我们的理由是毛主席说：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办到的，女人也能办到。单是女知青敢上山砍柴，就让村里人大跌眼镜。

上山的小路多两三尺宽，除了拾级而上的台阶，就是沙石路面，如果走得急了会脚底打滑。上山后20里内，已经没有什么柴可砍了，早让村民一年又一年砍秃了。就是新长起来的灌木，也太细，不值得，村民们多让它们长着。往深处走，才能看到越来越密、粗细相当的灌木。

到了可砍柴的地方，一群村里人就分散开来，找自己有利的地形砍起来。当然，尽量砍些已经枯死的柴，实在没有了再砍长成的灌木。

◇ 一根扁担两边各扎上一捆柴一步一个颤悠，是很危险的

南方、北方山区砍柴人怎样砍、怎样捆扎、怎样担柴，都不一样。这里的地形，遇到窄窄的山路，一边是高大的山体，一边就是深不见底的沟涧。如像南方人一根扁担两边各扎上一捆柴一步一个颤悠，是很危险的。扁担一不留心撞到山体，重量失衡，会把人甩到深沟里。

我们村的人砍柴是把长两丈左右的两捆柴在顶部打成一个交叉十字，用一根较粗的棍子横在两捆柴中间，分别捆实，两柴中间的这根棍就充当上肩的担子。

下山时，肩担横棍，两手扶着两边的柴捆；这边肩膀累了，一扭，就换成了那边肩膀。最初，我们一不会砍柴，二不会捆扎，三不会肩担，村里大人小孩都教我们。

第一次进山，因为肩膀吃不住力，一路走一路扔，回来时，我们每人连抱带提，身上的柴也就二三十斤了。后来，我们能和村里人一样砍柴、肩担，每次下来一称，女生能担八九十斤，男生能肩担一百多斤。

有一次，下山惯性的疾走，使我的球鞋打滑，摔了一跤，一担柴脱手滚出，栽进了沟底，幸好后面的男生拉了一把，人才没有一块滚下去。

每次担柴走二三十里下山，回来后，人累得都要虚脱了。吃上一大海碗面条（约有一斤面所做），身上顿时有了力气，再到坡下挑一担水也不成问题。毕竟年轻啊！

山里到底有多深，不可知，上了这山又见那山。有一次，我们走到山里近三十里深处，看到一户人家，住在青石板一片片搭成的小屋里，门前有一口浅浅的山泉井。一问，房主人是从河南逃荒来的，听口气说的好像就是60年代那场大饥荒。

他们没有参加当地的公社生产队，不属于哪个村子的人，没有当地户口；各种运动来了，也没有人对他们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当然，孩子大了也无处去上学。他们吃的是自己种的土豆、瓜菜，此处海拔较高，无霜期很短，山下的农作物在他这里不能生长，只能在树林边上、坡地上种些土豆。

他们的土豆非常好吃，蒸熟就开花，吃起来又沙又面，不像山下的那么涩。主人见到我们很高兴，立即蒸土豆给我们吃。村里有人认识他们，看到我们这几个城里人，他们更加好客友好。

我们问，一年四季只吃土豆怎么能行？他们说，也背些土豆到山下换玉米、小米，但已经是很稀罕珍贵了。吃的盐、醋，也是拿土豆换来的，还采一些山珍草药去卖。

虽说一年四季的劳作很辛苦，但我们精神上还是乐观的，可谓累并快乐着。后来让我们最头疼的不是周而复始的劳作，而是陷入村里的家族矛盾。

◇ 小事我们还能忍，可最厉害的一件事发生了

这个村李家是大户，但不知什么原因，本是同宗的两户李家，成为宿敌。因为我们住的是其中一个李家的两孔窑洞，自然和这一边李家院里院外的亲戚、邻居关系搞得很好；无形中让对立方的李家不高兴了，总找茬儿和我们过不去。

比如，对立方李家在生产队里有点权，在分粮、分菜、分油上总要克扣我们一些。我们向生产队明明借的是玉米，还粮时说借的是麦子。在村里，乡里乡亲借什么从不打借条，结果吃亏了。

小事我们还能忍，可最厉害的一件事还是发生了。村里砖窑烧好等着外边人来买砖的一段时间里，总有外村人半夜来偷砖。队长觉得知青比较正直，与村民无利害之争，就让男知青在窑上日夜看守。

赵二湖在夜里几次赶走外村覬觐偷砖的人，他们怀恨在心，就暗地勾结村里的人，想教训知青一顿。一天，我们和社员正在生产队的菜地里翻地收萝卜，只见四面来了十几个陌生的面孔，又见村里有人给他们打手势，他们就一拥而上拿着棍子、锄头朝着赵二湖劈头砍来。

等我们反应过来，去阻拦，赵二湖的头已经被打破，满脸是血。打人的人看村里人都涌来，赶紧跑掉。我们根本顾不上他们，让人找来一个薄门板，抬上二湖就往二十里以外的公社医院跑。

村里几个要好的小伙子帮助我们轮流抬人，二湖被抬到公社医院缝了几针，打了破伤风针，拿了药，返回村里已经是半夜了。

洪洞人性子烈，好打架，在晋南是出了名的。我亲眼看到，叔伯兄弟俩一边锄地，一边吵嘴，说着说着，一方抡起锄头向对方头上砍去，立即把他鼻梁开了个口，血流一脸。

事后我们得知，帮助外村人打赵二湖的村里人就是有意和我们过不去的对立方李家。很快，公社和县里的知青办知道了这件事，发了一个文件，大意是如有恶意伤害知青者按反革命论处，把事件的严重性提得很高。

从此，各方面对我们的态度好转了很多，村里人认为，我们是有政府撑腰的。但从这时起，我心里的悲凉也油然而生，这就是让我们学习的贫下中农吗？这就是我们要扎根农村的广阔天地吗？难道我们真要在哪里永远呆下去吗？悲观情绪阵阵袭来，每天傍晚看落日的心情也不一样了。

到了农村，才知道中国的广阔天地是什么样子。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让我们很快成熟，同时也付出了蹉跎青春的代价。在最应该学习知识、开拓精神文化视野的年龄，我们到了那么封闭的精神空间。因此，怎能说青春无悔？

□ 来源：《北青天天副刊》2017·03·02

~~~~~

【亲历者言】

文革中我给江青做秘书（四）

· 阎长贵 ·

（上接 z k 2 0 0 5 a）

九、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专政”

江青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有超乎陈伯达、康生的特殊地位。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叫做“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回忆说：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她在小组中横行跋扈，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数），“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实行独裁，胡作非为。（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9、81、87页）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不过是个傀儡，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是听江青的，陈伯达是常委、文革小组组长，地位很重要，但在常委会上陈伯达就讲：“我不过是刘盆子。”（见《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889、712页）

曾任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对陈伯达自称“刘盆子”，做了明确的解释：陈伯达之所以这样讲，无非是让人知道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江青当家，他这个组长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259页）穆欣还进一步解释说：

陈伯达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他是江青眼中的“刘盆子”，是其他成员心目中的傀儡。凡事他都得看江青的眼色行事……江青这个女人，她依仗第一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假传“圣旨”。……每逢开小组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只要江青还没到会，陈伯达这个组长和其他小组成员就得耐着性子等候；开会时，经常由江青包场，哇啦哇啦地说个没完，从不顾及别人的想法；一旦她与陈伯达发生了分歧，江青就叫大家休会，把陈伯达拉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原地休息，直等陈伯达被打通回来继续开会。江青心胸狭窄，喜怒无常。得意时，胡侃神聊，一不如意，佛然大怒。夏天她怕冷气，别人再热，也得把空调关掉；她讲话发言时，不怕别人震耳欲聋，可是，她却不许别人出大声……在小组里江青俨然就是凌驾全组之上的“女皇”。（同上书第368—369页）

中央文革小组刚成立的时候，陈伯达说话还管事，江青和其他文革小组成员对他也比较尊重。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时间界线，就是1966年8月陈伯达生病住院前后的变化。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这之后，陈伯达便大权旁落，江青便大权独揽，尤其是陈伯达回到文革小组后，更是每况愈下，我们清楚地看到：小组成员对组长陈伯达的话似可听可不听，指示可执行可不执行，而对江青的话和指示那可是说一不二，一点折扣都不能打，江青对小组成员颐指气使，小组成员对她毕恭毕敬。

我还是先说说主要当事人的反映吧。陶铸在文革中曾对他夫人曾志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让人受不了！”（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

王力在他回忆录中曾记述江青逼陈伯达和她打倒陶铸、她骂陈伯达的事：1967年1月4日江青和陈伯达公开宣布打倒陶铸，1月8日毛泽东予以肯定，到2月10日又批评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并说：这件事就是你和江青二人搞的，他要文革小组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吓得陈伯达要自杀，他说：“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陈伯达说，那一天，我都吃了安眠药了，是江青硬拉着我去的。康生也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评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康生在王力、关锋顾全大局的劝说下主持开会，江青藉口身体不好不参加，会议只批评了陈伯达，没有一个人批评江青，而对陈伯达的批评也是轻描淡写——因为陈伯达都要自杀了，谁也不好再说很硬的话。后来江青知道陈伯达要自杀的

事，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王力反思录》第976—977页）

一次，在十一楼的会议室，不知江青和陈伯达商量或争论什么问题，忽然听到江青劈头盖脸地数落陈伯达：“你张口‘小小老百姓’，闭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么‘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自称‘小小老百姓’，不是谦虚，是推脱责任！”没听到陈伯达说什么，只听到他长叹一声，“唉……”

“小小老百姓”确实是陈伯达的口头禅，不论见了谁，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他都双手抱拳：“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是小小老百姓！”

1967年1月的一天，我到在十六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值班室去，看到江青和陈伯达并排坐在沙发上，陈伯达哭丧着脸，低头不语，江青对着陈伯达说：“看你吓的那样，这么怕，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不知道江青为什么这样说。后来知道是这么回事：1967年1月19日，陈伯达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上批评萧华，说：“萧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陈伯达的话马上传到北京军区，北京军区造反派立即行动，要抓萧华，萧华从后门越墙逃走，抄了家。毛泽东说萧华还要保，陈伯达吓坏了。江青这次教训他，是给他打气、鼓劲。

江青对陈伯达的态度这样，不能不影响到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我看到，王力、关锋、戚本禹对陈伯达也不尊重。在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后，一次在十六楼的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公然奚落陈伯达，说他接受陶铸的礼物；陈伯达不说什么，竟冒出这样一句：“请本禹同志替我在主席、江青同志面前多美言几句。”听到陈伯达向戚本禹这样求情的话，我感到很惊讶！这求情的话我觉得有两个含义：一是他知道戚本禹和毛主席、江青的关系好；二是希望、也是告诫或者说请求戚本禹不要在毛主席、江青面前说他的坏话，打他的小报告。关于陈伯达收受陶铸礼物的事，后来我问了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王文耀，他们说，是陈伯达托陶铸从香港买的一个收音机，根本不是陶铸送的什么礼物。

顺便说说江青对陈伯达妻子刘叔晏的态度。1967年11月中旬我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一天，陈伯达夫人刘叔晏给我打电话，对我的文章夸了一番。我说：“叔晏同志，您有什么事啊？”她说：“我想请您跟江青同志说一下，麻烦江青同志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我原来是搞《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范若愚专案的。我想进一步研究一下知识分子演变的规律。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您写个条子转给我就行。”我有点犯难，但还是说：“好吧，我帮您问问江青同志。”有一天晚上，江青看完电影从十七楼走向十一楼。她走一段要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趁她坐在椅子上休息的时候，我向她报告了刘叔晏请她安排工作的事。江青气狠狠地说：“陈伯达的老婆怎么叫我给她安排工作？她的工作应该由汪东兴安排。这个地主婆不好好干事，还叫我给她安排工作，别理她！”江青叫我“别理她”，我当然不能给她传递什么信息；但她毕竟是陈伯达的夫人啊！在一段时间里我真怕碰到刘叔晏……。

## 十、毛泽东给江青修改文章

江青的文章都是自己写，主席帮她修改。据我所知，在文革中，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最突出的有三次：一是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二是1966年11月《江青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三是1967年4月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

民立新功》（简称《立新功》）。江青这些讲话和文章经过毛泽东的修改，不仅规范了文字，提升了思想政治内容，更主要地是扩大了影响，大大提高了江青的声誉。

我看到毛泽东对江青文章方面做了一些怎样的修改：

第一方面，凡江青说到“毛主席领导”的地方，都加上“党中央”；凡江青说“毛主席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

《纪要》讲到“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纪要》讲到“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毛泽东改为“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

《纪要》讲到近三年来出现了许多“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毛泽东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

《讲话》讲“对于我们党内的反对毛主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泽东改为“对于我们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立新功》讲“目前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毛泽东改为“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

第二方面，凡是江青宣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过分的地方，毛泽东都改得低一些或者删掉。《纪要》说，《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够我们无产阶级用几百年的了”，毛泽东将最后一句改为“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纪要》还说，“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峰”。毛泽东删去了这些话。在《立新功》中，江青讲道：“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这应是事实，不知毛泽东为什么要删去。

第三方面是，江青讲事情和问题不准确或分寸不当的地方，毛泽东均做了适当的修改。

《立新功》原稿上讲文革前十七年，文艺创作“基本上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完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加了苏修的一套”。毛泽东把其中的“基本上是”改为“大量的”，将“那完全是”改为“那几乎是”。

还有，原稿上讲到文革前“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毛泽东把“都是”改为“大量的”。

毛泽东把江青极端的言辞，改得富于分寸感，但否定文革前十七年的实质并未改变；就像文革初期，毛还是赞扬推崇江青，但他绝不用溢美之词，还要求江青懂得自敛。

第四方面，凡是吹捧江青过火，或江青自吹自擂的地方，毛泽东也都做了必要的纠正。

《纪要》讲到在座谈过程中，江青“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毛泽东就把后面一句删去了。《纪要》发表时又把删去的这句改为“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帮助”。

《讲话》讲到“北京京剧一团是首先接受我提出的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毛泽东删去了“我提出的”四个字，改为“北京京剧一团是北京首先接受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在“和我一块努力的结果”后面，又加上了“在别人首创的基础上加工或改制”十四个字。《讲话》讲到“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文学艺术”，毛泽东改为“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立新功》中，江青讲到她在建国初期辞去一些工作职务时

说：“我自己思想上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改为：“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这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

江青的《立新功》，是1967年4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15日，江青写了一封信，请毛主席为其讲话批改，信上说：这是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改了几次，缺引证，不够典，因为没有发言稿。我希望得到你的批改。毛主席完全满足了江青的要求，两次给她批改。对江青说的“缺引证，不够典”，毛主席特别地加了一段理论性十分强的话。这就是《为人民立新功》中那些排黑体的将近200字的话。这段话加在江青讲完《触谗说赵太后》故事的后面，全文为：

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毛主席这些话，大大提升了江青这篇讲话的理论性和历史感。使它成了标志着文革一个阶段的一篇重要讲话。

刚才我们议论了毛泽东对三篇重要著述的修改。《纪要》不好说就是江青个人的著述，应该说是一个集体的著述，最多也只能说是江青主持下编写出来的。毛泽东对《纪要》修改过三遍，原来的标题是《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毛泽东修改时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

添加这六个字，非同小可，是借林彪的权威来提升江青的影响力。虽然有人说林彪并不情愿。可以说，《纪要》是江青崛起和走上政治舞台的界碑。同时，《纪要》又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要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纪要》的构思、整理和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重要的步骤。所以突显林彪的大名，把他和江青绑在一起，是毛主席的用心，表明毛泽东要倚重林彪，拉他一起来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毛泽东修改江青的文章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毛泽东给江青《为人民立新功》一处的修改。在《为人民立新功》原稿中，有一个地方说到“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像圣经一样。”

毛泽东把“我的话也不听”中的“也”字改成“更”字，当时（1967年4月）看到这里我被震惊了，心里长时间暗暗发笑，心想毛主席真厉害，真细心，也是对江青的真爱护，把“也”字改成“更”字，一下子就把江青的地位拉正了。按照原来的说法，“主席的话不听”，可以理解为“尚可”，“我的话也不听”，那还行，那还了得——这不是把自己摆在主席之上、或至少是平起平坐了吗？！

## 十一、毛泽东和江青是“政治夫妻”

其实，江青早就说她和毛主席是“政治夫妻”。这一点，现在似乎也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了。但是，应该如何理解“政治夫妻”的内涵，还是有很大歧义的。有一些纪实作品，强调说江青找毛泽东，是看重他的地位，是要靠着毛泽东向上爬，“夫贵妻荣”；或者说毛泽东和江青夫妻感情冷漠，由于江青身体的原因，他们早就没有夫妻生活等等，以此来理解

“政治夫妻”关系。当然理解允许见仁见智，但我个人认为，所谓毛泽东和江青是“政治夫妻”，特别就其晚年，其主要和基本含义，应该是他们在政治上相依为命。

江青是否有虚荣心？不好说否。但当年对“革命领袖”的爱慕乃至崇拜的，恐怕也不乏其人；至于江毛男女之好，究竟二人谁更主动，或是一见钟情，似也可稽考。江青好像说是毛主动追求她的。不过，这些和“政治夫妻”有多大关系呢？

文革前，江青在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以及对俞平伯等学者《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都与毛心心相印，说明他们在政治上，在政治思想、政治情感上，颇多一致。陶铸夫人曾志是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战友，她在回忆录中有一段很生动、很细腻的叙述：“江青在生活上很忽视主席，但主席对江青却是关怀备至。江青患子宫原位癌，在苏联做了放射治疗，主席念她有病，处处照顾她让着她。在广州，主席总是将自己的一号楼让给江青住，而自己到较小较差的三号楼去住，将自己身边最喜爱的四个警卫人员派去照顾江青。他还特意交待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他说：“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江青虽然只是一个秘书，但无论到哪里，看文件都必须按政治局委员待遇。（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2000年1月第二次印刷，第320页）

有些文章或文学作品显然夸大了毛江之间的距离，甚至把他们描写得水火不容，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一位将军（少将）说在文革中江和毛“背道而驰”。这完全是罔顾事实的一种说法。

我翻阅过《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从1949—1976年，共13册。我看到，建国后毛泽东经常批一些文件、一些国内外材料，让江青看，让江青研究；而江青也常送一些材料给毛泽东看；不论毛泽东批给江青看和研究的，还是江青送给毛泽东看的，其内容都是富有政治性的。可以看出，毛泽东十分注意在政治思想上指导和培养江青。我还看到，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颇为自得地谈到，她“多年来都是给主席做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江青在这里说到她是主席的“哨兵”，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他们“政治夫妻”的关系。

为我经历了文革初期，我看到，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被授予重要职务，并奉毛泽东之命，斩关夺隘，冲锋陷阵。这里我试举几件事情。

一、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第一把火，是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而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出面组织的。1967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直言不讳地说：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我不用叫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关于文革，我认为可以这样推断：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只有他和江青两个人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第三号人物周恩来以及总书记邓小平都蒙在鼓里。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亲自给江青写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还讲了几乎跟任何人都不能说不便说的一些“黑话”，包括对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非议。

1967年“七二零武汉事件”后，毛泽东认为军队支持右派“，于是8月4日他以“润之”署名致信江青，提出要“武装左派”，要发枪100万支。这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战略思想和部署，当然也是产生了严重后果的战略思想和部署。毛泽东也是首先把它告诉江青，通过江青向全党、全国贯彻。

在文革中，毛泽东住中南海游泳池，江青从1966年7月20日从外地回到北京后，主要住钓鱼台十一楼。那时，只要下午不开会，或没有什么活动，江青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毛泽东，而我从没听说过毛泽东拒绝她去。至于毛泽东对江青有所厌恶，不让江青去见他，甚至还有警卫人员敢于挡驾，江青也无可奈何，那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而江青则不折不扣地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同样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也刻有江青的痕迹和印记。

后来毛泽东确实也表现出对江青的不满，甚至不让江青去看他，前后这种变化，我觉得这是“恨铁不成钢”，绝不意味着毛泽东对江青的放弃。据我看，毛泽东在大跃进失败后，特别是想发动文革的时候，包括文革初期，很可能有让江青接他班的打算，也就是想让江青成为“武则天”，但时间不久发现江青没有武则天的本事。大概在1973年，李讷和她妈妈江青吵架，李讷说：“你想当武则天啊，你还没那个本事！”这是不是反映和传达了毛泽东的意思？试想，这话除了毛泽东和李讷，其他人，包括毛远新，谁敢说出口？！所以，在“九一三”事件中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摔死了，其后，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让江青当接班人，但毛泽东也从来没有要打倒过江青的意思。可能照他看来，江青做接班人未必合适，但无疑还是维护文化大革命最坚决的人。毛泽东和江青都把文化大革命视为命根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文革中，毛泽东自己可以和江青怄气，可以让她难看；但别人，包括林彪、邓小平在内，谁胆敢与江青作对，毛泽东都不会容忍，都会视为是冲着他来的。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